

五代十国

经济史

杜文玉 著



學苑出版社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基金资助

五代十国经济史

杜文玉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代十国经济史 / 杜文玉 著.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5077-3797-4

I. ①五… II. ①杜… III. ①中国经济史-五代十国时期 IV. ①F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9965 号

责任编辑: 郑泽英

封面设计: 陈四雄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 book001. com

电子邮箱: xueyuan@public. bta. net. 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 (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

开本尺寸: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 5

字 数: 503 千字

印 数: 0001-2000

版 次: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 00 元

自序

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五代十国史的研究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都是薄弱环节，无论是研究成果，或是从事研究人员的多少，都无法与其他断代史相比。可喜的是，近年来，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大批的人员都把研究方向放在了这一领域，尤其是中青学者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不仅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而且还出版了不少的专著。在国别史研究方面也是如此，对十国中的绝大多数政权都有专著问世，少量没有出版专著的，也都有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有所涉及，估计不久也会有专著出版的。

笔者早在许多年前就有志于五代十国史的研究，并且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也出版过几部这方面的著作，现在出版的这部《五代十国经济史》是笔者在这一断代史研究中的又一部新作。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课题进行研究，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直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一部这一断代的经济史专著问世。凡是有关中国古代经济史的著作，不是将这一历史时期的经济轻描淡写地说上一段，就是根本避而不谈，即使有关隋唐五代经济史的专著，也是如此。这种状况显然不符合我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因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连续性，不可能跳过一个历史时期而向下一个历史时期发展，即使这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也不能忽略不谈，更何况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其次，笔者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曾经看到过不少有关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方面的史料，所反映的一些经济现象为唐代所无，很值得关注，于是便有意将此类史料收集起来。在最初还没有撰写一部断代经济史的打算，只是将收集到的相关史料，陆续写成单篇论文发表，待这类论文发表得多了，才产生了写成专著的想法。当然，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海内外学术界也先后有不少有关五代十国经济方面的论著问世，可资参考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了，也对笔者产生这个想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最后，五代十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新成就以及形成的不同于唐代的新的经济格局，必须撰成一部具有一定篇幅的专著才能够全面完整地反映出来。这些新的经济成就或者说经济发展的新特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地主私有土地及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有所发展。这是由于自唐末以来频繁的战乱导致了人口流散，大量的土地荒芜，中原王朝为了保证赋税的正常收入，不得不采取招抚流亡，鼓励开垦土地，并把逃户田地分配给农户耕种的政策。此外，政府还把原为国有的营田无偿分配给佃农耕种，这种情况在后周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从而使唐后期以来已经失去了土地的自耕农重新获得了土地。至于地主土地所有制更是各国政府着力加以保护，就不多说了。

第二，农业经济作物种植规模有所扩大，并出现了专业化的趋势，表明农业商品化趋势加快了。这种发展趋势与唐代相比明显不同，并为两宋时期农业商品化的进一步发

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手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出现了一些新的手工业行业。这一历史时期有所发展的手工业主要有铸钱、织布、印染、造纸、印刷、制茶、制瓷、文具等行业，其中文具制造业中的制墨业、制砚业未见于唐代，至少在那时尚未形成规模化，故可视为新出现的行业。当然所谓发展也是与唐代相比而言的，是相对的。

第四，商业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内商业格局发生了变化，以南北方贸易为主要贸易方向，其中南方对北方以茶叶为主要贸易商品，而北方对南方则以畜产品为主要交易商品；二是商业都市与唐代相比有所增加。这一时期的各国都城无疑都已发展成为大的商业都市，如汴梁、洛阳、杭州、金陵、福州、广州、长沙、江陵、成都等，此外，扬州、洪州、岳州、楚州、苏州、越州、宣州、梓州、通州、阆州、夔州、灵州、幽州等，也都是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商业城市。三是对外贸易的格局发生了变化。由唐代的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的外贸方式，一变而为以海路对外贸易为主了；对外贸易商品则以原来的以丝绸为主，变为以瓷器和丝绸为主了。

第五，区域经济有所发展并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在这一历史时期主要形成了六个经济区，这是根据中国古代自然地理的特点和当时各割据政权的疆域情况，以及其经济发展的特点，综合起来加以考虑而划定的。这就是以中原王朝统治区为主的北方经济区，南唐和吴越所在的江淮经济区，荆南和马楚所在的两湖经济区，前后蜀所在的川蜀经济区，南汉和王闽所在的闽广经济区和甘州回鹘与归义军所在的河西经济区。这六大经济区的形成，是这一历史时期整个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结果，并且各具独特的经济特点，为两宋时期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六，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完成于这一历史时期，这只是笔者与一部分学者的观点。关于经济重心的南移问题，无论是起始时间还是完成时间，在学术界都是有争议的，经过长期的讨论后，在起始时间问题上已逐渐趋于一致，但在完成时间上仍有争议。造成研究结论分歧的最大的原因，主要是学者们所持评估标准各不相同，随着在标准问题的分歧上逐渐取得一致，相信这一学术问题取得公认结论的时间当不会太久。关于这一时期经济格局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区域经济变化较大，原来比较落后的两湖、闽广地区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变化，自唐后期以来发展较快的江淮、川蜀地区继续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而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只是在五代后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性发展。

当然对五代十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成就也不能评价太高，从各个经济领域的情况看，有发展也有萎缩，比如畜牧业和林业生产就有所萎缩；有的领域内部发展不平衡，如水利事业南方有所发展而北方则严重萎缩；手工业也是如此，其矿冶业、制盐业、造船业和丝织业，或有所萎缩，或属于恢复性发展。

研究这一断代经济史也存在不少的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乃是研究资料的贫乏和零散。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基本上没有多少利用价值，薛居正的《旧五代史》由于《食货志》的严重残缺，可资研究的史料也不多。最重要的还是《五代会要》、《册府元龟》等典籍，但是仅仅依靠它们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扩大史料的搜寻范围，举凡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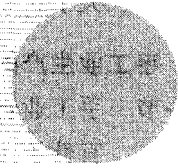
宋时期的杂史笔记、地理方志、农书类书、文人别集、金石碑志、文学汇编、宗教典籍、敦煌文书等，无不在搜寻范围之列，甚至包括钱谱、画史、药典以及砚史、墨史等类，至于明清之人辑考的史籍和杂著等，也不敢有所忽略。从本书书末所附的参考文献看，引用的各种典籍共 200 余种，如此始敢下笔撰写，尚担心有所遗漏。从笔者的经验来看，宋代史籍中保存的有关五代十国的经济史料非常重要，《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自不待言，就连专记有宋一代典制的《宋会要辑稿》一书中，也保留了不少有用的史料。此外，10 世纪前后阿拉伯人撰写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对了解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情况也非常有用。

总之，花在这一部书上的时间以搜集史料为最长，断断续续持续了一二十年时间，集中精力研究与撰写的时间只不过三四年时间，如果把以前撰写论文的时间也算在内，那就很长了，可见学术研究之艰辛程度，这一点相信其他学者也都是感同身受的。

由于五代十国时期是一个分裂割据的历史时期，在南北方先后出现过十几个政权，如果能够把这些政权的经济情况分别写出来，当然是再理想不过了，但是由于相关史料极其缺乏，欲要做到这一点，显然是不可能的了。此外，五代十国时期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虽然分裂成若干个相对独立的政权，形成了数个经济区，但是这些区域之间却有着十分紧密的经济联系，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济社会，因此，本书的这种写法也还能说得过去。总之，本书的撰写是一种尝试，其中的缺点和不足一定是难以避免的，希望能够得同行专家的指教，以便将来有机会再版时，加以修改补充。

2010 年 12 月 30 日于古都西安

目录



第一章 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1
第一节 人口的数量与分布	1
一、人口数量的考证.....	1
二、人口的迁徙.....	5
三、人口的分布与密度.....	7
第二节 土地形态	11
一、国有土地的种种形态	11
(一) 屯田	11
(二) 营田	14
(三) 皇庄与官庄	17
二、地主私有土地	20
(一) 地主私有土地	20
(二) 寺院土地	23
三、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	26
第三节 水利建设	29
一、北方的水利成就	29
二、南方各国的水利成就	34
三、发展特点及局限性	40
第四节 农业生产的发展及其特点	43
一、耕作技术与农具的改进	43
二、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45
三、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	50
(一) 花卉业的发展	50

(二) 水果业的发展	54
(三) 药材种植的扩大	58
(四) 蔬菜种植的专业化	60
(五) 桑蚕业的发展	61
(六) 水产养殖业	62
四、关于农业商品化趋势	64
第二章 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及其特点	66
第一节 手工业管理体制	66
一、官营手工业管理部门	66
二、私营手工业的管理	67
第二节 手工业的门类及发展水平	68
一、矿冶业的情况	69
(一) 矿藏的分布	69
(二) 冶铁业与金银制造业	70
(三) 铸钱业	73
二、染织业的发展	80
(一) 丝织业	80
(二) 织布业	84
(三) 印染业	85
三、与文化相关的产业	87
(一) 造纸业	87
(二) 文具业	89
(三) 印刷业	92
(四) 文化产业发展的意义	95
四、制茶业的发展	97
(一) 茶区的分布	97
(二) 种茶技术的提高	110
(三) 制茶业的发展	112
五、制瓷业的发展	115
(一) 分布的状况	115
(二) 技术的提高	118
(三) 艺术特点	121
六、造船业与制盐业	122
(一) 造船业	122
(二) 制盐业	126



第三章 商业与交通的发展及特点	132
第一节 国内商业的情况	132
一、商人的活跃与都市经济的繁荣.....	132
二、南北方之间的贸易情况.....	138
三、区域市场与乡村商业的发展.....	141
(一) 区域市场的形成	141
(二) 乡村商业的发展	145
四、与周边民族的贸易情况.....	151
五、商业发展的局限性.....	155
第二节 对外贸易的情况	157
一、与朝鲜半岛的贸易.....	157
二、与日本的贸易.....	159
三、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的贸易.....	161
四、惨淡的陆上对外贸易.....	166
第三节 货币经济	170
一、钱币紧缺问题.....	170
二、币制紊乱问题.....	174
三、白银进入流通领域.....	175
四、各国货币政策.....	183
第四节 交通运输的发展	187
一、重要的陆路交通线路.....	187
(一) 开封至于阗的交通线路	187
(二) 开封至上京、黄龙府的交通线路	190
(三) 开封至莱、登等州的交通线路	194
(四) 开封至岭表的交通线路	195
(五) 长安至成都的交通线路	197
二、重要的水路交通线路.....	199
(一) 黄河以南的水路交通线	199
(二) 黄河以北的水路交通线	203
(三) 南方各地的水路交通线	206
三、海上交通的发展.....	209
(一) 国内交通情况	209
(二) 对外交通情况	211
第四章 畜牧业与林业的状况	214
第一节 畜牧业的发展情况	214
一、管理机构与监牧分布.....	214

二、地方与诸国牧马业·····	219
三、有关畜牧业之政策·····	221
四、周边民族畜牧业的生产状况·····	224
第二节 林业的发展情况·····	228
一、林业管理与法规·····	228
二、城市与农村植树·····	232
三、对林业发展状况的评估·····	237
第五章 赋役制度的变化·····	242
第一节 两税实施及其变化·····	242
一、关于两税的定税问题·····	242
二、关于两税税额的问题·····	245
三、折纳、纽配、加耗、预借等问题·····	250
四、增溢概量、会钞与两税的分配·····	256
第二节 杂税的征纳·····	258
一、丁口税的恢复·····	258
二、杂变之赋的征收·····	261
三、资产与农副产品税·····	264
第三节 名目繁多的商税·····	266
一、茶法与茶税·····	266
二、盐政与盐税·····	270
三、其他商税·····	276
第四节 繁重的徭役·····	277
一、名目繁多的力役·····	278
二、杂徭与职役·····	280
三、役法的混乱·····	283
第六章 其他经济问题的研究·····	286
第一节 区域经济的发展及特点·····	286
一、中原地区的经济状况·····	286
二、江淮地区的经济特点·····	288
三、两湖地区的经济特点·····	289
四、川蜀地区的经济特点·····	291
五、闽广地区的经济特点·····	293
六、河西地区的经济特点·····	295
第二节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问题·····	300
一、学术史的回溯·····	300

二、评估经济重心形成的客观标准·····	303
三、南移的起始与完成时间·····	305
第三节 五代十国的经济地位·····	311
一、经济发展的几个新特点·····	311
二、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313
三、对其经济地位的评估·····	315
参考文献 ·····	317
后 记 ·····	330
附表：	
表 1-1 五代户口数求算表 ·····	3
表 1-2 唐五代相同地区户数比较表 ·····	7
表 1-3 五代末年南北户口数比较表 ·····	8
表 1-4 五代末年各地人口密度表 ·····	8
表 1-5 中原王朝治理黄河工程表 ·····	30
表 1-6 花卉种类表 ·····	53
表 2-1 五代十国金银器进贡表 ·····	71
表 2-2 五代十国铸币种类表 ·····	73
表 3-1 各地进贡白银数额表 ·····	180
表 6-1 南北方户口、人口数比较表 ·····	306
附图：	
图 3-1 五代十国陆路交通示意图 ·····	199
图 3-2 开封府周围的水道图 ·····	202
图 3-3 天平渠及其周围水道图 ·····	206
图 3-4 中江系统的水道图 ·····	208

第一章 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五代十国时期的农业经济与唐代相比，北方的发展相对滞后，而在南方却有较大程度的发展，尤其是经济作物的生产发展较快，农业商品化程度较唐代为高。在土地制度与农田水利建设方面，亦取得一定的成就，土地私有化程度进一步加快。所有这一切都为两宋时期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节 人口的数量与分布

人口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古代社会，人口数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社会劳动力的充足与否，关系到政府的财政收入的多寡。正因为如此，历代王朝无不重视对人口的控制，尤其是在以人丁为主要征税对象的历史时期，更是如此。五代十国时期的人口问题，由于史籍记载零散，且数据不一，因此需要认真地考证，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结论。

一、人口数量的考证

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人口数量，文献没有直接的记载，这是由于五代各朝立国短暂，又忙于战争，大都没有检索户籍之故。唯有后周进行过此项工作，故论述五代十国时期的人口问题，只能以后周时期为据。据《册府元龟》卷四八六《邦计部·户籍》载：显德五年（958年）十月，“命左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使于诸州，简定民租。明年春，使回，总计简到户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淮南郡县不在此数。”这是五代时期简定户口的唯一记载，然而并不可靠。后周夺去淮南14州时，所获户口数为226574户，^①再加上各国入宋时的户口数2336934户（见表1-1），加上此次检定的户口数，全国的总数已达4873320户。而宋太宗统一全国后，即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的户数仅为3574257户，^②至道三年（997年），全国户数为4132576户，^③二者相差何其大也！此外，这个数字也接近唐武宗会昌末年的4955151户的水平。^④唐朝自安史之乱后，户口数大减，经过近百年的恢复发展，才达到这个水平，为唐中后期户口数的高峰。经过唐末五代的七八十年的战乱破坏，人口死亡流散严重，因此，在后周末年无论

① 《册府元龟》卷二〇《帝王部·功业二》，219页。

② 佚名：《枫窗小牋》卷上，4758页。

③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六，5005页。

④ 《册府元龟》卷四八六《邦计部·户籍》，5814页。

如何也不可能保持如此之多的户数。

另据其他典籍的记载，后周被北宋取代之时，即建隆元年（960年）时，宋朝获得的户口数仅是967353户。^①这一数据与上引的显德五年的户数相差颇大，两次统计仅仅相隔两年，其间又没有发生重大战争和灾害，户数不应有如此之大的减损，因此这两种数据中必有一误，需要进一步地考证。

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十一月新定天下县等级，“合定为望县者六十四、紧县七十、上县一百二十四、中县六十五、下县九十七。”又据当月敕令，三千户以上为望县，二千户以上为紧县，一千户以上为上县，五百户以上为中县，不满五百户为下县。^②姑且以此标准计算，上述诸县户口总数为537000户。此数可能略低于实际户数，但相差不至于太多。加上显德时周世宗夺取淮南诸州所获的226574户，从辽朝手中夺取的宁、莫、瀛等州的18361户，^③从后蜀手中夺得的秦、凤、阶、成等州的数万户口，共计约为八十几万户。根据当月敕令，赤、畿、次赤、次畿等类县不在新定县等内。所谓赤县指京城内之县，畿县指京都郊区之县，这类县所管户数虽然比一般县多，但县数毕竟少，户口有限。如将此类县以及次赤、次畿等类县的户口算在内，估计有90多万户，接近宋受周禅时的户数，决不致超过此数。这是广顺三年时的户口数字，此时距显德五年不过五年时间，人口虽然有自然增殖，但不会太多，绝不可能一下子增加138%的户口，所以，显德时所检定的户口数肯定有误。从显德五年到宋建隆元年，不到两年时间，户口数不会有大的变化，因此，可以认定建隆元年的这个数据是可靠的。^④

北宋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扫平诸国，最后完成统一大业。累计各国入宋时的户数，加上北宋承袭后周的户数，总计为3304287户。然而，此时距后周末年（以公元960年计）已经过去了19年，其间户口必然自然增长，因此，这一数据还不能视为后周末年的全国户口的总数。根据《玉海》卷二〇《宝元历代户数》载：“太宗朝三百五十七万四千二百五十七。”这个数据是太宗末年的，还是宋太宗统一全国后的数据？关于这个问题，《枫窗小牍》卷上有明确的记载，所谓“太宗拓定南北，户犹三百五十七万四千二百五十七”。可见是宋太宗统一全国后的数据。根据这个数据与上面累加的数据，就可以推算出这19年户口增长了8.17%，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0.43%。这样，就可以进一步推算出宋初全国每年自然增长的户数，从而求出五代末年（960年）全国的实际户数。由于各国入宋年代早晚不一，只能分别求算。各种具体数据见表1-1

据表1-1可知，五代末年全国的总户口数为3189473户，只要得知户平均人口数，即可求出当时全国总人口数。五代的户均人口数，史无记载，然五代的户籍制度仍然沿袭唐制，所以唐代的户均人口数大体可以反映出五代的情况。唐朝在天宝十三载（754

① 见《文献通考》卷一一《户口考》、《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载：此年全国户数为967443户，比前两书所记多出了90户，可以忽略不计。

② 《五代会要》卷二〇《量户口定州县等第》，325页。

③ 《册府元龟》卷二〇《帝王部·功业二》，219页。

④ 有人认为周显德五年简定的户口数是可靠的，见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上册，439~445页；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152页。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妥当，具体理由详见正文。

年), 户均人口为 5.83 口,^① 马端临也说: “唐人户口至盛之时, 率以十户为五十八口有奇。”^② 户均为 5.8 口。但是自唐末以来, 由于社会动荡, 户均人口数应该有所下降, 在五代时期姑且以户均 5 口计, 这样就可以推算出五代全国人口数约为 15947365 口。

表 1-1 五代户口数推算表^③

国名	入宋时户数	入宋年代 (公元)	入宋时距后 周末年年数	总增长率 (%)	推算所得 后周末年户数
A	B	C	D	E	F
后周	967353	960	0	0	967353
荆南	142300	963	3	1.29	140488
湖南	97388	963	3	1.29	96148
后蜀	534029	965	5	2.15	522789
南汉	170263	971	11	4.73	162573
南唐	655065	975	15	6.45	615373
清源	151978	978	18	7.74	141060
吴越	550684	978	18	7.74	511123
北汉	35227	979	19	8.17	32566
合计	3304287				3189473

以上推算的五代人口数只是各国在籍人口的情况, 未著籍的人口不在其内。五代时期未著籍的人口大致有如下几类:

其一是僧侣。五代时期佛教寺院众多, 每县不下 20 处。后汉时李钦明估计北方有僧尼 10 万余人,^④ 实际不止此数。周世宗在显德二年 (955 年) 灭佛时, 全国有寺院 33030 所, 废去了 30336 所, 保留了 2694 所, 保留僧尼 61200 人,^⑤ 平均每寺 22.72 人。如以此寺均人数计算, 全国应有僧尼 750442 人。然而周世宗废去的多为中小寺院, 或者没有敕额的寺院、兰若, 而保留下来的多为规模较大的寺院, 因此, 上述的寺均僧尼有些偏多。退一步按每寺平均人数 10 人计, 中原王朝统治区域内的僧尼人数也不下 30 万。此数还不包括其他各国的僧尼人数, 比如襄州附近就有大量寺院, 据敦煌文书 S·529 (V)《诸山圣迹志》载: 襄州“城周廿五里, 寺院五十所, 僧尼千余人。”^⑥ 此卷约撰于后梁末年至后唐同光、天成年间。可见这一带寺院分布之密集程度。

其二是贱民阶层。我国历代王朝多不把贱民纳入国家户籍, 五代时期亦是如此, 如官私奴婢、乐工、杂户等。此类人数在五代为数不少, 如后梁乾化元年 (911 年), 杜廷隐一次就把深、冀两州的全部丁壮掠为奴婢。^⑦ 大量人口沦为奴婢, 严重影响了政府赋税收入, 故又多次下令释放奴婢。另外, 宫廷中的宫女、宦官也不纳入国家户籍。此

① 黄盛璋:《唐代户口分布与变迁》,《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91~108页。

② 《文献通考》卷一一《户口考二》,考118。

③ B栏的各国户数引自《文献通考》卷三一五《舆地考一》,《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亦有相同的记载。 $E = D \times \text{年均增长率} 0.43\%$; $F = B \div (1 + E)$ 。

④ 《册府元龟》卷五四七《谏诤部·直谏一四》,6575页。

⑤ 《旧五代史》卷一一五《周世宗纪二》,1531页。

⑥ 郑炳林等:《敦煌写本〈诸山圣迹志〉作者探微》,《敦煌研究》2005年第1期,1~8页。

⑦ 《资治通鉴》卷二六七后梁太祖乾化元年正月,8736页。

类人员的数量也不会少，仅后唐庄宗在同光三年（925年）一次就征召民间女子3000人入宫，^① 宫中的实际人数肯定大大超过了这一数字。南方各国宫廷中的此类人员也不少，如南汉宫中的宦官就不下万人。推而广之，各国此类人数也是很可观的。

其三是浮寄户。唐末五代时期由于种种原因，社会有大量浮寄户存在，这些人户都不在政府的户籍之中。他们“或投名于势要，以求影庇；或希假于摄贵，以免丁徭”。^② 从而也隐匿了不少户口，其中也包括一些富户在内。这种脱籍的人户在五代时期为数颇多，试举一例，以见其一斑。如阶州由于人口太少，仅千余户，长期以来无法置县。后唐长兴中，王弘贇任刺史时，采取措施检括人户，结果检出主客户共3200户，于是依旧额设置了将利、福津二县。^③ 这种脱籍人户过半，或者三分之二的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阶州一处，其他各州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为了增加赋税收入，各朝政府多以官田赐之，使其变为纳税的正户。仅后周广顺三年就收浮寄户3万余为正户，^④ 或者采取置营田招浮寄户耕种的办法，以增加赋税收入。^⑤ 当然，更多的措施还是命令地方政府严加检索，清查隐寄户口。

其四是军队。五代十国时期的军队是招募而来的，无论禁军还是藩镇军队，均是如此，他们皆非税户。至于各国的军队人数，史书只有一些零星的记载，前蜀拥兵30万，后蜀军队人数不见于记载，估计不低于前蜀之数。吴越归宋时有兵15万，荆南有兵3万，北汉有兵3万，南汉有兵15万，陈洪进所管的漳、泉二州有兵1.8万。南唐军队人数不详，宋灭南唐时，仅神卫都虞侯朱令赆所统率的江西军队就达15万，估计其全部军队亦不下30万，再加上中原之兵与湖南之兵大约有30万，估计总数在120万到130万之间。^⑥ 这一历史时期的军队家属，皆随军而行动，依靠军饷和朝廷赏赐过活。此类人不事耕作，不负担赋税徭役，亦不入州县户籍。往往是两三千人的军队，就有男女万余口相随。推而论之，其数量亦是很惊人的。

其五是逃户。在五代时期引起农户逃亡的原因，不外三种，即战争残酷，赋税苛重，灾荒频繁。逃户的数量也很大，如后唐同光三年（925年），“是时，两河大水，户口流亡者十四五”。^⑦ 后晋天福八年（943年），“河中府奏：逃户七千七百五十九”。^⑧ 张彦泽任泾州节度使时，“苛虐部民，逃者五千余户”。^⑨ 刘禧任单州刺史，“自之任，招复逃户二千四百六十七”。^⑩ 翻检史籍，此类记载，比比皆是，不烦再列举了。

由于以上原因，在这一历史时期政府能够控制的户口数与实际情况肯定有相当大的差距，虽然周世宗在显德五年派人进行过检籍工作，从而使后周控制的户口数较之其他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后唐庄宗同光三年三月，8932页。

② 《旧五代史》卷三八《唐明宗纪四》，519页。

③ 《旧五代史》卷四一《唐明宗纪七》，568页。

④ 《旧五代史》卷一一二《周太祖纪三》，1488页。

⑤ 《五代会要》卷一五《户部》，255页。

⑥ 分见《新五代史》卷二四《郭崇韬传》、《吴越备史·补遗》、《十国春秋》卷一〇一《高继冲世家》、《十国春秋》卷一〇五《北汉武英帝纪》、《十国春秋》卷六〇《南汉后主本纪》、《十国春秋》卷九三《陈洪进传》、陆游：《南唐书》卷五《朱令赆传》。

⑦ 《旧五代史》卷三三《唐庄宗纪七》，463页。

⑧ 《册府元龟》卷四九二《邦计部·蠲复四》，5886页。

⑨ 《册府元龟》卷六九二《牧守部·招辑》，8256页。

⑩ 《册府元龟》卷六九二《牧守部·招辑》，8256页。

诸朝要多一些，然欲要完全杜绝上述现象，则是不可能的。需要说明的是，后周在世宗统治时期令行禁止，吏治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宰相范质每“命刺史、县令，必以户口版籍为急”。^① 所以，上面所说的户口数当不至于相差太大。

二、人口的迁徙

五代十国时期的人口迁徙方向，就中原地区而言，其大致方向主要有两个，即向北迁入契丹境内，向南迁到江淮乃至两湖、闽广一带。迁出人口的构成，向契丹迁徙的多为普通民户，鲜有士大夫阶层，而向南迁徙则两类人皆有。

先来看向契丹迁徙的情况。自唐末以来，由于中原地区社会动荡，战争频繁，实力下降，契丹乘机发展并日渐强大起来，于是便不断地侵扰中原边境，掠夺人口，抢掠财产，致使大批汉人流入契丹境内。耶律阿保机统治时期，“燕之军民多为寇掠”，^② 于是“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③ 由此可见流入契丹的汉人数量之多。此后，契丹并没有停止向中原的掠夺，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仍不绝于史书，如公元902年，进攻河东一带，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④ 公元921年，“分兵略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⑤ 除了契丹出兵掠夺人口外，也有一些中原官员主动降于契丹，往往也带去不少的人口。如公元907年，平州刺史刘守奇，“率其众数千人来降”。公元915年，“幽州军校齐行本举其族及其部曲男女三千人请降”。^⑥ 随着契丹境内汉族人口的增多，于是便仿效中原制度，筑城安置，所谓“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在生产上契丹允许汉人继续从事农耕生产，在生活上仍然保持原状不变，以至于出现了“汉人安之，不复思归”的景象。^⑦ 至后晋时期，随着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不仅使其境内的汉人数量大大增长，也进一步促进了契丹农业生产的发展。

中原人民向南迁徙在唐代始于安史之乱，唐末黄巢起义以来达到了一个小高潮，至五代十国时期，南迁的步伐又一次加快，使得大量的人口迁徙到南方各地。

其迁徙的方向主要是：江淮地区、巴蜀地区、闽广地区和两湖地区。迁徙的形式有多种，一种是规模较大的有组织的迁徙，如唐末中原军阀秦宗权曾派部将孙儒率大批军队南下，与杨行密争夺江淮。战败后，除一部分骁勇者被改编为黑云都外，其余降兵大都遣散务农。河东李克用遣骑军救援山东朱瑾兄弟，被朱全忠击败，无法北归，只好南下投奔杨行密，同时带去了大批骑兵部队，其后皆定居于江淮。契丹灭亡后晋时，又一次掀起了北人南迁的高潮，大批中原人民为躲避契丹杀掳，而迁到了江淮一带。南迁人口中也包括一些统治阶级之人，如后晋大将皇甫晖率3000人奔江南，棣州刺史王建、安远节度使卢文进等也先后率众南奔。再比如光州人王绪、王潮率众5000余人，一路

① 《宋史》卷二四九《范质传》，8796页。

② 《旧五代史》卷一三五《契丹传》，1828页。

③ 《辽史》卷七四《韩延徽传》，1231页。

④ 《辽史》卷一《太祖纪上》，2页。

⑤ 《辽史》卷二《太祖纪下》，17页。

⑥ 《辽史》卷一《太祖纪上》，3页、10页。

⑦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契丹》，886页。

攻城略地，辗转进入福建地区，后来以这部分人为骨干建立了闽国政权。河南舞阳人王建，为忠武军都督，唐末率军入川，驱逐了节度使陈敬瑄，后来建立了前蜀政权，其骨干军队均为中原之人。在湖南建立楚国的马殷，许州鄢陵人，早年投奔秦宗权为将，孙儒率军南下时，他也随军行动。战败后，孙儒部将刘建锋率领残兵一部约7000人逃向江西，被割据于江西的钟传击败，于是只好折向湖南。刘建锋被人杀死后，众人推举其部将马殷为首领，逐渐攻占了湖南地区。因此，马殷与其部下诸将包括军队中的骨干，皆为中原之人。

另一种则是举族而迁，如泉州清溪县詹敦仁，自光州固始避乱迁闽，隐居于仙游植德山下。“后迁泉州，杜门不出，被留从效辟为清溪令，政尚德重，举王审知孙王直道为代，不数载均挂冠引退。”^①《莆田康氏家谱》序云：其始祖因石敬瑭之乱，“逃难入莆霞江居焉，于是开族于莆。”闽国的一些重要人物如杨承休、郑璘、归传懿、杨赞图、郑戩、王琰、杨沂、崔道融等，皆携家相继避乱来闽。^②江南一带也是北方士大夫集中避难之地，如郑元素、张延翰、卢白、魏岑、韩熙载、高越、殷崇义、史虚白、陈陶、许规等，莫不是南迁的北方士大夫，其中不少人是携家口、率宗人而南下的。^③西蜀之地也是北方士人避难的好去处，所谓“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故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④著名的士人有韦庄、卢廷让、毛文锡、牛峤、牛希济、杜光庭、张道古等辈，皆是自北迁徙入蜀的。

在这一历史时期，普通民众举家迁徙的人数也不少。如赣南宁都县的廖、李、吴、管、郭、崔等姓的人户，是唐后期分别从河北、陕西、江苏、山东、山西等地迁来的；赣省腹地的泰和县，当唐末战乱之季，“四方大姓之避地者辐辏而至。曾自长沙，张自洛阳，陈、严、王、萧、刘、倪等族，皆自金陵而占籍焉，而生齿之繁，逐倍蓰于旧”。吉安文氏，南丰吴氏，是唐五代之际由成都迁来。^⑤其中大部分为北方之人。在其他地区，迁徙来的北方人口也不少，如居于建宁的张睦，祖籍为光州人；居于建阳的黄子棱，祖籍为洛阳人；居于兴化的董氏乃陇西人，萧氏乃河南兰陵人，蔡氏乃济阳人；居于仙游的陈洪进，祖籍为临淮人。^⑥这些都是五代时期迁闽的中原之人。从北方迁到南方其他地区的人还很多，就不再列举了。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给南方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生产技术，有利于南方的开发，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那么，在这一历史时期到底向南方迁去了多少人口，具体数据史籍缺载，不好论定，但是通过一些数据的比较，还是可以看出一个大概的情况。唐代的江南东西道辖境，相当于五代末年的南唐、吴越、湖南、清源军的统治区。由于时代不同，行政区划有些变化，故进行了一些小调整，使两者所辖区域基本相符，然后才能进行比较。从表1-2的数据看，五代十国时期这些地区的户数虽然低于天宝年间，但却远远高于唐元和年间，说明自天宝以来，南北方户口

① 阳思谦：《万历重修泉州府志》卷二九《名宦一》。

② 引自何敦铤：《中原、福建、台湾人口迁徙之探索》，《福建学坛》1989年第4期，79~80页。

③ 参见拙作：《南唐史略》，45页。

④ 《十国春秋》卷三五《前蜀高祖本纪上》，501页。

⑤ 许怀林：《中国人口迁徙与江西的客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18页。

⑥ 何敦铤：《中原、福建、台湾人口迁徙之探索》，《福建学坛》1989年第4期，79~80页。